

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

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
己卯年

《上海茶叶对外贸易》编辑委员会 编

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

《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开本:889×1192 1/16 印张:29 插页:10 字数:632,000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内部资料)

上海市北印刷厂印制

厂址:上海中山北路840号 邮政编码:200070
电话:56970779总机转各部 传真:56322030

《上海茶叶对外贸易》编辑委员会

顾问: 于宝森 于黎光 徐 厚 习吉耀 林学浩 薛仲林
邢信福 沈振华 席宽华 何耀曾

主任: 黄汉庆

副主任: 张进军 黄 政 蒋智慧 朱秀良

主 编: 徐永成

副主编: 尹在继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海平 尹在继 米大年 孙玉存 陆祖康 陈导醒 陈慧敏
宋翠娟 汪小霞 吴明新 张志芳 周久安 金列英 徐永成
徐家骅 裘 刚 曹吟凤 童 欣 魏安江 瞿泳棠

撰稿人: 尹在继 孙玉存 沈海宝 严琴艺 陆泰和 陆新葆 张培文
张鑫根 陈正岳 陈伟大 余存森 何松年 李宗云 查培基
钱朝柱 曹育一 程林根 胡美芳 胡秀月

编 辑: 尹在继 程林根 严琴艺

摄 影: 徐永成 杨冠钧 徐勤中 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样宣部

序 言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叶出口历史悠久。在历史上,茶叶是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在一段时期内,茶叶出口位居其它商品前列。中国出口茶叶曾长期垄断国际市场,以后也占主导地位。随着印度、斯里兰卡红茶和日本绿茶的兴起、发展和大量出口,中国茶叶出口随之下落,开始由盛转衰。解放后,中国茶叶重新崛起,茶园种植面积、茶叶产量和出口全面发展,重新成为茶叶经济大国。至1998年,中国茶园面积110万公顷,居世界第一;茶叶产量66.5万吨,居世界第二;茶叶出口21.8万吨,居世界第三。1950—1998年中国茶叶出口450万吨,出口金额79亿美元,对国家经济发展、出口创汇和茶区脱贫致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海茶叶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早在1685年就有茶叶运销海外的文字记载。1817—1827年(嘉庆廿二年道光七年)10年间,中国棉布、丝和茶叶三大出口商品多数从上海出运。鸦片战争前,上海已形成茶叶行业并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茶叶出口不断增加,1869年曾高达45,893吨,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47.5%。由于多种原因,1911年开始各口岸茶叶出口下降,但上海仍保持在4—6万吨出口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在历史上,上海以茶叶等农副产品出口为主,带来服务业发展,为上海成为经济中心城市作出贡献。受国际竞争、两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等影响,中国茶叶出口不断减少,上海茶叶出口随之不断下降,1942年仅1,161吨。1948年上海茶叶出口也只有9,050吨,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51.71%。

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先后接管中国茶业联营公司和大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华东区国外贸易总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后改组成立中国茶业公司华东区公司。1955年1月又改组为中国茶业公司上海分公司,经营远洋绿茶和红茶出口,兼营可可制品出口。

在外贸统制时期,上海茶叶出口不断增加,成为重要的茶叶出口口岸。1950年上海茶叶出口1.1万吨,1979年达6.1万吨,出口金额1.4亿美元。1950年开始的30年间,上海茶叶出口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1—79%,随着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茶叶出口经营权放开,实行多口岸出口,随即上海茶叶出口计划配额逐年减少,从1986年开始上海茶叶出口明显下降。1991年出口降至3万吨,1993年为2.1万吨,1994—1996年每年只有1.7万吨。

1996年12月4日,国务院下发五部委《关于改进茶叶出口管理促进茶叶生产发展的报告》。1997年6月5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开始承担全国茶叶出口协调工作。1997年7月和1998年7月,外经贸部先后颁发《茶叶出口管理

暂行办法》和《茶叶出口经营管理办法》，从1998年8月10日起，国家对茶叶不再实行统一联合经营。

1997年上海茶叶出口回升至1.9万吨，1998年为3.05万吨，开始恢复性增长。

1950—1998年上海茶叶出口154万吨，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34.22%；出口金额24.8亿美元，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金额的31.44%；可可制品出口23万吨，出口金额6.3亿美元。加上新商品出口，累计出口金额达35亿美元。

从50年代起，上海通过茶叶拼配技术，创立了一套绿茶分级标准样茶号，为出口提供大批量品牌茶叶，对实现出口茶的规模化、标准化和规范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为中国绿茶开拓国际市场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1956年起，先后创立天坛牌、万年青牌等品牌，在国内外获金质奖、国际最优质量服务奖、国家金质奖、银质奖和国优、部优以及市优质出口商品奖。公司直属茶厂13个科技项目获外经贸部科技进步奖，其中1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3年开始公司进入改革时期。在主营茶叶，兼营可可制品出口前提下，对企业产业与经营作了结构性战略调整，实行以出口为主，进出口结合，自营出口和代理出口结合，以外贸为主，内外贸结合，结合人员分流，大力发展实业，发展新商品，开拓新市场。在转换经营机制同时，改革劳动人事和工资制度，建立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经过艰苦努力，公司几年来的出口金额始终保持在1.1亿美元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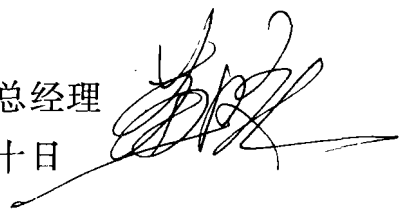
1998年公司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抓住新的机遇，及时优化出口商品，调整出口市场，加强经营监管，努力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直接影响，使全年出口与上年基本持平。

1999年是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成立50周年。全年工作任务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保持稳定和良性的经营，提高效益，优化经营结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大力开拓非洲市场。同时，积极推进企业内部改革，调整组织结构，严格财务、成本管理，经营组织作优化组合，建立经营考核指标，试行岗薪、底薪加工资提成制试点，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做好再就业工作。

回顾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50周年历程，分析整体环境和形势，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在前几年改革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各方面努力，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潮中找到新生。

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编写说明

一、上海茶叶出口历史悠久,是全国茶叶出口的重要口岸。《上海茶叶对外贸易》记述的就是上海茶叶出口的全部历史过程。

二、按内容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总论》,上篇包括上海开埠前后及民国时期的上海茶叶对外贸易;下篇为解放后经济恢复和各个五年经济建设时期,直至1998年的上海茶叶对外贸易。其中还包括改革开放后中国茶叶流通体制改革、茶叶出口经营管理体制变化和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经营机制转换;第二部分《分论》包括外销茶叶货源、出口商品、商标和茶叶出口国别地区;第三部分为《备忘录》包括大事记、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历年机构变更情况,历任领导任职时间,商品、科技项目获奖名录,公司及厂、库获荣誉称号名录,先进人物名录以及历年统计报表。

三、为全面反映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业务经营实际情况,本书列入了可可制品和新商品进出口业绩和统计数。

四、本书统计采用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国茶叶出口统计汇编和公司业务统计数据。受历史条件限制,个别资料不全,数字短缺。

五、本书使用量、值单位,均按资料年限使用的为准。

六、为有利于分析上海茶叶出口经营情况,书中编入了中国茶叶和有关口岸的数据供参考。

七、本书编写前,即1992年10月,公司组织钱梁、何耀曾、尹在继、陈君鹏、王克昌和程林根、沈海宝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搜集《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经营史录》所需资料;事后又由尹在继、程林根搜集提供《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所需茶叶对外贸易有关材料。1997年4月14日,公司决定编写《上海茶叶对外贸易》,正式成立编委会。上述相关有用材料被《上海茶叶对外贸易》采用。公司聘用尹在继、程林根、严琴艺为《上海茶叶对外贸易》专职编写人员,朱宏璋整理统计数据。

八、书中注释采用通码脚注方式放在后页。

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目 录

序 言 编写说明

第一部分 总 论

上 篇 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第一章 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1)
第一节 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	(1)
第二节 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	(1)
第二章 开埠后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2)
第一节 开埠初期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2)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6)
第三节 清代末期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18)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24)
第一节 华茶出口衰落	(24)
第二节 上海茶叶出口	(26)
第三节 上海茶叶出口商行	(39)
第四节 上海洋行的茶叶买办	(51)
第五节 洋庄茶栈	(56)
第六节 土庄茶栈	(60)
第七节 上海茶业组织	(66)

下 篇 当代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第一章 经济恢复和“一五”时期	(73)
第一节 经济恢复时期	(73)
第二节 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时期	(84)
第二章 “二五”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01)
第一节 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时期	(101)
第二节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19)
第三章 十年“文革”时期	(133)
第一节 “文革”初期	(133)
第二节 “文革”中后期	(148)

第三节 “文革”末期	(172)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至“七五”时期	(189)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	(189)
第二节 第七个五年经济建设时期	(219)
第五章 “八五”时期和公司机制转换时期	(256)
第一节 第八个五年经济建设时期	(256)
第二节 公司机制转换时期	(296)
第六章 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生产经营结构	(333)
第一节 子公司	(333)
第二节 直属厂、库	(339)
第三节 合资企业	(345)
第四节 境外机构	(347)

第二部分 分 论

第一章 外销茶叶货源	(349)
第一节 概 述	(349)
第二节 变 迁	(352)
第二章 出口商品及商标	(358)
第一节 茶 叶	(358)
第二节 可可制品	(370)
第三节 新商品	(374)
第四节 商 标	(376)
第三章 茶叶出口国别地区	(376)
第一节 亚洲市场	(377)
第二节 欧洲市场	(379)
第三节 美洲市场	(384)
第四节 非洲市场	(385)
第五节 大洋洲市场	(391)

第三部分 备 忘 录

一、大事记	(393)
二、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历年机构变更表	(407)
三、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历任领导任职时间	(407)
四、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获奖商品名录	(408)
五、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科技项目获奖名录	(410)
六、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及基层厂、仓获荣誉称号名录	(411)
七、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先进人物名录	(411)
八、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历年统计报表	(412)

第一章 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第一节 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

(公元 739—1643 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两县归属秀州^[1],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已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2],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3]。景祐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4]。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5]。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珪提举浙西茶盐^[6],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7]。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入,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已有住户 72,502 家^[8],“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庶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9]。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10]。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 29 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11]。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第二节 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

(1644—1840 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应置重典”^[12]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管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

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13]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塽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14]。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舶,一年已达80余艘^[15]。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60万斤,中等可载20—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16]。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17],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18]。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货物,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著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19]。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20]。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21]。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已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已有茶商45家^[22]。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23]。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入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第二章 开埠后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第一节 开埠初期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1843—1860年)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又是南北沿海交通枢纽。开埠之前商业已显繁盛,不少远洋船只,也多云集于此。出口茶叶的主要产地,如浙江、安徽、江西等省,所产之茶从水路直运上海,由

于地理条件优越,倍受中外商人重视。开埠之后,很快成为我国丝、茶集散中心,居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口岸之首。

一、1843 年上海开埠

1843 年 11 月 17 日上海宣告开埠,英帝国主义以鸦片战争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上海。五家英国洋行,即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宝顺洋行(DENT, BEALE & CO.)、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义记洋行(HOLLIDAY WISE & CO.)、广源洋行(J. MACKRILL SMIEH)紧随英国驻沪领事巴尔富(CAPTAIN BALFOUR)来到上海、开展鸦片和丝、茶、棉布的进出口贸易^[24]。1845 年英商沙逊洋行(D. SASSOON SONS & CO.)、祥泰洋行(RETHERBONE WORTHINGTON & CO.), 1846 年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也相继来沪租地开业^[25]。此后,原在广州开设的洋行,先后都把贸易重心转到上海。到 1851 年,上海已有洋行 36 家^[26],其中经营丝茶业务的有 20 家,占 56%。

开埠之初,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北移上海,原在广州的大批买办、通事、掮客等,也纷纷来沪充当洋行的中介人。其中比较有名的人物,是原在广东从事华洋贸易的阿林(ALUM)。他随外商洋行北来上海,充当英国商人的掮客。一面教授本地商人如何与外国商人进行交易,并通过他们将英国商品推销到内地。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与内地丝茶产区有过的联系,推动内地丝茶商人来沪与外商交易。1845 年,由阿林经手的贸易额,竟占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27]。初期的交易方式,多以现银支付为主。嗣后,几乎完全为物物交易。英国商人用鸦片、棉毛织品进行以物易物。中国茶商与丝商,也在其丝茶价格上,再加相当款额,即可成交^[28]。只有多余的鸦片,才与中国消费者以银两支付,不过这种交易方式,每笔都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一批完成,即告结束,缺乏连续性,因此,数量不大。故当时的茶叶交易主要仍在广州进行^[29]。

二、开埠后茶叶出口

据英国驻沪领事德庇时 1847 年 2 月 24 日致巴麦尊勋爵的报告中写道:上海开埠已经三年了,它作为贸易地点经过了考验……是令人满意的。中国两项主要出口商品茶叶和生丝的增长是十分显著的。1844 年茶叶输出量是 544 吨,至 1847 年已增加到 7.197 吨^[30]到第三年,上海出口至英国的茶叶,已占英国消费总量的五分之一^[31]。

1848 年,产区茶商把茶叶运到上海,或售取银两,或与上等棉布交换;茶商再把这些棉布卖给苏州掮客,或者委托上海的钱庄出售。因为钱庄的期票是可靠的,茶商可以毫无困难地立刻以很少的贴水,兑换现银,所以期票受到茶商的欢迎^[32]。

上海的茶叶出口迅速发展,与运输路线近便是分不开的。从主要产茶区运到广州,运费约占茶价的 70%,而运到上海,仅占 50%^[33],这样上海的茶价就比广州便宜 20% 左右^[34]。

1843 年 10 月 8 日,继《南京条约》之后签订的《虎门条约》第六款规定,英商“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这样英商只好通过中国茶商去内地产区收购。中国茶商根据与英国商人签订的合同,派人携带现款到产区收购茶叶,这种办法在广州早已实行,上海相继仿效,这是上海市场上取得相当数量的高档茶的方式之一,也是英商当时最迫切的要求^[35]。

据《上海研究资料》所载:最好的茶叶在顺治初年,每斤值银二两,如徽州产的松萝茶也可售一两,顺治十年(1654 年)后茶价渐廉,到了康熙年间,最好的茶价不到一两,松萝只值二钱。开埠后的外销茶价渐涨,1845—1846 年,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 46 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担约售 40 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 24—27 两。当年平均售价为 37 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嗣后茶价逐年下降,十二年中,落价较小的是工夫红茶,下跌 44%,其次是熙春和小珠,分别下降 48—49%,跌幅最大的是

屯溪茶,下跌 57%,各茶平均价下跌 51%以上,其变化情况如下表:[注]

上海历年出口茶叶价格表

单位:担/两

年 度 上年 7 月 1 日至下年 6 月 30 日	熙 春	工 夫	屯 溪	雨 前	小 珠	平 均
1845—46	46.0	27.5	24.5	40.5	46.5	37.0
1846—47	39.5	20.0	20.5	32.0	34.0	29.2
1847—48	32.5	18.0	16.0	32.5	34.5	26.7
1848—49	32.0	14.0	16.0	29.0	33.5	24.9
1849—50	21.5	17.7	11.2	19.5	27.5	19.5
1850—51	25.5	17.7	14.5	24.0	29.0	22.1
1851—52	24.5	14.5	15.0	23.5	28.5	21.2
1852—53	21.5	14.0	16.0	24.5	26.5	20.5
1853—54	24.5	15.5	15.0	21.7	26.0	20.5
1854—55	28.3	15.0	13.7	23.2	24.5	20.9
1855—56	23.7	15.0	12.2	18.5	25.7	19.0
1856—57	23.7	15.0	10.5	18.2	23.7	18.2

注:姚贤镐著《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1 册,第 582 页,引自 1857 年额尔金在上海英商总会上关于海关税则与一般贸易关系报告书,见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17/356。

随着外国商行在沪开业的增加,除江西、湖南、湖北的茶叶,仍沿旧道运往广州出口外,安徽、浙江、福建之茶,都先后运到上海出口^[36]。其运输路线:安徽徽州的绿茶集中到屯溪,由新安江经杭州水路运到上海;祁门红茶或经屯溪,或送九江运达上海,水路不过十天;浙东的平水茶,由绍兴起运,经杭州到上海,只需五天。崇安的武夷茶运到福州只需四天^[37],若运往江西河口,再由水运到上海,则需 24 天。如果由武夷山区运至广州,全程则需六周或两个月^[38]。这样,普通茶叶的茶农收入,仅占出口茶价总值的 40.93%,而其它费用的支出却占 59.07%,详见下表:[39]

每担茶价[注]	9.773 两银	100 %
其中:茶农收入	4 两银	占 40.93 %
茶箱及包装费	0.847 两银	占 59.07 %
批发商额外费用	1.00 两银	
运输费	1.359 两银	
杭州府厘金税	0.037 两银	
上海出口税	2.530 两银	

注:当时米价每斤 80 文,一两纹银 = 2000 文。

当时中等以上高档茶茶农的收入,平均每斤约 160 文,每担的收入就有八两纹银,约占出口总值 58.08%,其它费用为 5.77 两,占出口总值的 41.9%。出口茶的包装费、运输费、税金等各项支出,基本相同,高档茶的获利,比普通茶丰厚。

三、上海茶叶出口首超广州

上海开埠之前,清政府只准广州一个口岸对外通商,各地茶叶也多运抵广州出口。开埠之初,1844 年上海只有 544 吨茶叶出口,嗣后逐年迅速增加,后因受太平军起义的影响,至广州的交通受阻,使江西、两湖之茶,改道转运上海,因此,1851 年上海口岸的茶叶出口达到 24,615 吨,首次超过广州口岸。185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 年上海的茶叶出口一度受到影响,到 1855 年初,小刀会起义失败,上海的茶叶出口高达 34,776 吨^[40],为开埠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

仅从上海运往美国的茶叶,就比广州出口的全部茶叶还多^[41]。1856年,上海茶叶出口较上年大幅度下降,减少44%。主要原因,据英国驻沪领事罗伯逊1856年的报告所载:“起义军攻打了江西、湖北、湖南及江南地区,并占领了这些省内产茶区的主要城市,如该项产品的集散中心,鄱阳湖顶端的湖口,地处鄱阳湖下端并通往广州路线的南昌,以及产茶中心地区的其他许多城镇,而且控制了水路交通,这一切都严重地妨碍了这项产品向沿海地区运输,大量茶叶,因运输不出而损坏,变得一文不值。……由于福州接近红茶产区,其周围地区并没有“叛军”的到来,它所提供的许多有利条件,诱使商人把茶叶装到那里去了^[42]。可见当时太平天国军的行动,影响了内地茶叶运往上海的数量,从而也促成了福州口岸茶叶贸易的发展。

1847—1858年上海茶叶出口量值^[注]

单位:吨/千英镑

年 份	数 量	金 额	年 份	数 量	金 额
1847	7,197	450	1853	22,559	2,485
1848	7,137	515	1854	16,390	1,794
1849	9,253	629	1855	34,776	3,414
1850	12,277	1,006	1856	19,475	1,647
1851	24,615	2,174	1857	20,745	3,352
1852	21,228	2,175	1858	20,624	2,774

注:根据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第318页,关担换算吨所得。出口值根据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51页。

上海开埠以来,以出口绿茶为主,红茶为次。1858年绿茶占68.67%,红茶占31.33%。其主要销售地区,据英国驻沪领事罗伯逊1858年的报告所载:红茶主销英国和其他欧洲大陆以及澳大利亚,分别占87.81%、3.7%和2.3%。绿茶主销美、英两国和加拿大,分别占67.42%、26.31%和2%。

具体销售目的地^[注]

单位:吨

目 的 地	红 茶	绿 茶	合 计
英 国	5,673	3,726	9,399
经福州、香港、黄埔转口国外	347	520	867
澳 大 利 亚	148	65	213
加拿大(蒙特利尔)	20	265	285
欧 洲 大 陆	240	33	273
美 国	32	9,549	9,581
菲律宾(马尼拉)		5	5
共 计	6,460	14,163	20,623

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50页,关担换算吨所得。

1851年后,除1859年因受太平天国战事影响,部分茶叶改由福州口岸出口外,其余各年上海茶叶出口一直居于五个通商口岸之首。

1843—1860年上海与其他四口岸茶叶出口数量^[注]

单位:吨

年份	上海	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年份	上海	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1843		8,044				1852	21,228	16,148			
1844	544	31,450				1853	22,559	13,487	2,722		
1845	1,754	34,655				1854	16,390	21,894	9,314		
1846	5,625	32,478				1855	34,776	7,560	7,137		
1847	7,197	29,151				1856	19,475	13,789	18,567		
1848	7,137	27,337				1857	20,745	8,891	14,455		
1849	9,253	15,785				1858	20,624	11,068	12,701	1,814	
1850	12,277	18,204				1859	17,781	11,431	21,168	1,996	60
1851	24,615	19,172				1860	24,252	15,906	19,233	3,266	968

注:上列数根据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第319页摘录,由关担换算为吨。

五个通商口岸虽然同时开放,但上海在 1844 年即有茶叶出口,福州、厦门、宁波直到 1853、1858、1859 年才有茶叶出口,上海 1851 年已超过广州,名列第一。广州居第二。1859 年之前,天台、宁波之茶运上海出口。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1861—1894 年)

一、茶叶外销有较快发展

自 1861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至 1894 年甲午战争,前后 34 年中,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英、法、美、俄等帝国主义者凭借其军事实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爱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上海又与英、法、美等国签订了《通商章程》,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特权。继《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外,又强迫清政府开放了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十埠为通商口岸^[43]。原来禁止进口的鸦片,已成为合法进口商品;原来不准深入内地购销的外商,已可自由出入长江沿岸各埠,推销他们的商品和收购丝和茶。这样,我国的对外贸易已进入了殖民地化的时期。

此时期茶叶外销有较大发展。据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汉口、九江等七个主要口岸的出口统计,1861 年的茶叶出口为 60,465 吨,时隔 15 年后,至 1875 年已增至 109,949 吨。其中上海的茶叶出口,也由 1861 年的 21,893 吨,增至 1875 年的 31,903 吨,增长 45.72%。如果与上海出口最多的 1869 年 45,893 吨相比反而减少 13,990 吨^[44],这是由于汉口、九江茶叶出口增加的原因,从下列对比中可看出:(注)

单位:吨

年 份	上 海	广 州	福 州	厦 门	宁 波	汉 口	九 江
1864	29,415	6,350	29,030	3,268	3,268	17,963	8,286
1874	34,582	6,169	40,824	5,080	9,556	28,365	14,818
1884	27,649	6,350	41,005	9,132	9,495	39,614	16,874
1894	27,456	726	29,514	1,754	9,798	42,155	12,938

注: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第 318—322 页,上海出口数根据《历年海关报告》。其中各口岸数有的包括复出口数统计在内。

1875 年前,全国茶叶出口之所以年年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国外茶叶消费市场发展很快。我国茶叶出口,占世界供应总量 81% 以上^[45],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上海口岸,在各通商口岸中,多数年间又居于首位,1860 年还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 38.1%。1861 年长江沿岸开埠后,上海的许多洋行纷纷在汉口、九江等口岸设立分行或联号。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所产之茶,可以就近择优选购,对他们更为有利。因此,这期间,大批洋行、茶栈涌向产地口岸设立行栈,收购茶叶。当时行栈之多,左宗棠在一篇奏稿中提到福州收茶时曾写道:“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行、茶栈林立,轮船消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故闽茶必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商”^[46]。1867 年英国驻沪领事文极司脱在上海贸易报告中,对 1861—1867 年茶叶购销情况的变化也写道:“自 1861 年长江贸易开放,带来新的局面,开始进入正常以来,这些商人们第一次真正感到满意的一年。外国人长期抱有的,在生产茶区扎根的希望,于 1861 年第一次得以实现,随之而来的极度兴奋,曾引起了长期的反应,但是到 1867 年,这种反应显然已告结束。此间的商人和英国的消费者所追求的,愈接近产地,产品愈便宜的想法,起初似曾部分实现,但后来表明,至少在中国向内地推进是徒劳无益的^[47]”。从他们多年来的

经营经验中认识到,深入产地购茶,不如通过中国城乡茶商,将分散的茶叶集中到口岸,在当地茶叶行栈和洋行买办的中介下,收购货源更为有利。这样既可坐收出口货源,又可节约人力、财力,而且受到本国领事的保护,在贸易上处于主动地位。因此,1869年开始,上海茶叶出口曾高达45,893吨,占全国出口总量49.7%。此后又逐渐转变为在口岸坐收货源的办法。

二、外销茶价有较大变化

对茶叶价格的确定,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按我国当年茶叶生产的丰歉作出决定,丰收则低,歉收则高。自7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茶叶出口价高低,则由洋商作出决定。因此,茶价逐年下降,这从1862—1894年的33年中,外销茶价格变化情况中可以看出,如下表:[注]

单位:担/海关两

年 份	红 茶	绿 茶	砖 茶	年 份	红 茶	绿 茶	砖 茶
1862	22.00	29.00	—	1879	18.07	23.52	5.05
1863	24.00	30.00	8.00	1880	17.64	22.25	9.15
1864	26.49	38.50	—	1881	16.01	21.45	5.93
1865	27.42	36.81	6.20	1882	16.05	22.87	5.95
1866	26.00	33.00	8.01	1883	17.01	20.42	6.86
1867	30.53	33.95	10.99	1884	14.80	21.75	6.05
1868	24.84	36.91	10.00	1885	16.39	19.41	5.40
1869	23.05	34.78	12.45	1886	16.74	18.41	6.14
1870	20.61	35.26	8.01	1887	15.13	16.49	6.98
1871	22.39	39.04	9.00	1888	15.39	19.52	5.95
1872	23.62	40.07	10.00	1889	16.23	19.85	7.12
1873	25.59	24.42	9.75	1890	17.88	18.55	7.19
1874	21.60	22.20	11.92	1891	20.75	17.15	7.08
1875	20.67	23.61	11.84	1892	17.15	28.43	7.16
1876	21.31	24.47	11.82	1893	18.43	24.15	7.00
1877	17.49	21.96	11.90	1894	18.85	24.88	7.08
1878	17.88	19.80	6.97				

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654页。

按上表所列,外销茶叶价格总的趋势呈逐年下跌之势。从33年的茶价变化中,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62—1877年的16年间,出口茶价处于较好水平,平均每担售价红茶为23.60两,绿茶为31.75两,砖茶为9.99两。第二个时期从1878—1891年的14年间,是出口茶价的低落时期,每担平均售价,红茶为16.86两,绿茶为20.10两,砖茶为6.56两。第三个时期从1892—1894年的3年间,是出口茶价稍有回升时期,每担平均价格红茶为18.14两,绿茶为25.82两,砖茶为7.08两。

从不同茶类看,红茶最高价格是1867年,每担平均售价达30.53两,一般年间也在20两以上。自1877年开始,由于印度、锡兰红茶的兴起,茶价迅速下跌,至1884年,每担价跌至14.80两,比最高年间下跌一半以上,多数年间都在15—18两之间。1891—1894年间,虽然稍有回升,但均价仍在20两银以内。绿茶最高价格是1872年,每担均价高达40.07两,多数年间在22—39两之间。自1878年开始,特别是1885年,绿茶价格大幅度下跌,至1887年,每担平均价仅为16.49两,比最高年间下跌58.85%。1892年后,由于对俄国、美国绿茶出口的增加,茶价有所回升,平均售价在22—28两之间。砖茶是三种主要茶类中售价最低的,最高是1869年,每担均价

12.45两,1877年前,多数年间每担均价在10两左右。自1878年开始,随着红绿茶价的下跌而下跌。至1894年的多数年间,每担均价在6—7两之间。

上海是以出口红绿茶为主的口岸,特别是绿茶,全国的绝大部分都经上海出口。其外销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全国茶叶的兴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红绿茶价的实绩,据英国驻沪领事达文波1878年的贸易报告和1881年度许士的贸易报告所载如下:

1876—1881 年度各地绿茶在上海的平均售价

单位:关担/两

茶 名	1876 年	1877 年	1878 年	1879 年	1880 年	1881 年
婺源高级茶	30—36	24—31	25—32	24—31	23—33	28—40
婺源中等茶	24—29	20—24	22—25	23—28	22—29	24—36
天台高级茶	29—35	25—30	24—26	25—35½	23½—35	26—40
天台中等茶	29—29	20—25	18—23	22—28	23—30	23—36
徽州茶	24—27	20—24	20—24	21—27	20—30	20—30
平水高级茶	33—40	28—38	30—40	25—32	23—34	26—40
平水中等茶	27—28	24—38	22—30	21—27	20—29	20—30
普通茶	17—23	16—20	17—20	16—27	16—22	16—29
普通平水茶	15—19	15—22	12—20	13—18	14—20	14—26

1879—1881 年度各地第二批红茶在上海的每磅售价

茶 名	1879 年			1880 年			1881 年		
	便士	先令	便士	便士	先令	便士	便士	先令	便士
宁州红茶	9½	—— 1	6¼	9¾	—— 1	5¼	9½	—— 1	6¼
祁门红茶	11½	—— 1	3½	11	—— 1	4	11	—— 1	3
湖北红茶	9¼	—— 1	0	10¼	—— 1	4	9	—— 0	11
河口红茶	9	—— 1	1½	9¾	—— 1	2	9	—— 1	2
安化红茶	9¼	—— 1	1½	10	—— 1	2	9¼	—— 1	2¾
湘潭红茶	9	—— 0	9¾	9	—— 0	9¾	7¾	—— 0	8

上海红绿茶的出口价格,虽与全国茶价的变动稍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一致的。如以1870—1874年的红、绿、砖茶的平均价作100%,1875—1894年的变化情况如下:[注]

年份	1875	1880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红茶	89	76	70	70	65	66	70	77	89	80	80	81
绿茶	73	68	60	57	49	60	59	57	53	57	74	77
砖茶	142	104	62	70	79	68	82	82	81	82	80	—

注:上表所列红茶均以每年7月第二批红茶的销售价格为基准。摘自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册,第385页。1994年版。

三、外销茶价下跌原因

1877年后茶价下跌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新兴产茶国的兴起,打破了我国茶叶一统天下的局面。印度自1839年开始仅有8箱茶叶出口,至1859年,出口量已达673吨,至1877年,又增至14,042吨。日本在1859年仅有绿茶242吨出口,至1875年已增至12,870吨。锡兰在1877年仅有